

新

课标·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

重读张志公·走进新课标

语文教育现代化

XINKEBIAO 总主编 邹贤敏
主 编 王本华
YUWEN CHONGDU ZHANGZHIGONG
ZOUJIN XINKEBIAO
JIAOYU LILUN YU
SHIJIAN CONGSHU



湖北教育出版社



课标·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

重读张志公·走进新课标

语文教育现代化

总主编 邹贤敏

主 编 王本华

CHONGDU ZHANGZHIGONG

ZOUJIN XINKEBIAO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张志公·走进新课标:语文教育现代化/王本华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新课标·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
ISBN 7-5351-3840-3

I.重… II.王… III.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2728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430074·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9.75 印张

版 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94 千字

印 数:1-2 000

ISBN 7-5351-3840-3/G·3148

定价:15.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总 序

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和《语文课程标准》的实验,将要开始的新课程与《语文课程标准》的全面实施,十分迫切需要和课程改革与《语文课程标准》紧密联系的学习资料。

《语文课程标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不仅充分吸取了国外母语教育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而且与国内的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特别是我国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和20多年来的语文教改,为《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丰富的经验积累,是研制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可以说,《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修订、完善和实验、实施的过程,就是对本国优秀的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不断进行反思与整合从而实现超越的过程。当然,这个反思与整合的工作不光是《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者和少数专门家的事,广大语文教师要想真正走进新课程,正确理解和努力实验、实施《语文课程标准》,积极参与《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完善,也必须重新学习本国优秀的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并对之进行反思与整合,实现超越。编辑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满足广大语文教师学习、研究、实验、实施新课程的需求,也是为了给各级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套精粹而完备的资料。

这套丛书共七本:《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张定远编)、《什么是语文——重读吕叔湘·走进新课标》(王晨编)、《语文教育现代化——重读张志公·走进新课标》(王本华编)、《近20年语文教改理论与新课程标准》(两册·潘纪平、邹元湘编)、《他山之石——国外母语课程改革与新课程标准》(庄文中编)。《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什么

是语文》《语文教育现代化》力求站在今天的高度重读“三老”，发掘“三老”教育思想中与时俱进、常读常新的精粹，选录“三老”论著中最有价值、最富生命力、与《语文课程标准》的根本精神最能与之相通的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三篇“丛书主编视点”，只是丛书主编个人对“三老”语文教育思想的认识，不代表各卷编者的看法。《探索与呼唤》主要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2003年10月公开发表的语文教育论文中精选或有理论深度、或有创新意义、或有直接参考价值、或有史料价值的部分，有少数几篇是约请有关作者改写、新写的，还收录了几篇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综述文章，以大致反映20多年来语文教育理论的整体面貌。这两卷的编选颇为困难，限于篇幅和识力，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挂一漏万”。《他山之石》从已公开发表、出版的译文译著和介绍性文章中选录，内容包括上个世纪以来国外母语课程改革的背景、趋势、基本观念，对母语教育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课程的性质与目标、训练体系、阅读写作教育、知识与能力）的认识与对策，教材编写和课程评价方面的共同性、倾向性的观点，尽量突出最有特色、最有借鉴意义的部分。

编选之初，我们给这套丛书的特色的定位是：内容精粹，信息密集，新颖实用，服务课改。现在这个目标是否达到，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当然只能由读者裁判了。我们期待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最后，我们要衷心的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总编袁定坤先生和本书责编徐耀明先生，这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都得到了他们热情的帮助。

编者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现代思维 超前眼光

——重读张志公

在当代语文教育研究领域，志公先生称得上是老一辈中最具现代意识的领跑者。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学毕业生语文没有学通”的现状，面对知识爆炸同传统思维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相对稳定性的矛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语文教学之所以有那么多问题，和我们在教材工作教学工作中一切‘率由旧章’不无关系。”准确击中了以传统思维方式为支撑的旧的语文教育思想的要害。他大声疾呼：研究中学语文教学在思维方法上“首先要有开阔的视野”。到九十年代初，他更鲜明地提出：“要跟着时代潮流走，也未尝不可以超前一些。”实际上是提出了转换思维方式、转换价值观念的任务，确立了现代思维方式在探寻语文教学规律上的方法论地位。而他自己，就是一位身体力行者。

语文教学怎样改革？怎样朝前走？他的回答高屋建瓴，一语破的：“语文教学要同现代化建设接上轨，不能坐等，要主动，主动去接轨。”“关键在于：语文教学必须大大提高效率。”思维方式的变革，常常取决于用一个全新的思维框架来看整个

问题的能力。张老就具备了这个能力。上述回答既“入乎其内”，为语文教学把准了脉；又“出乎其外”，让语文教学与时代需求发生共振。这种致思趋向源于开放、多维的现代思维方式。正如张厚感先生所言：“志公先生最少因循思想，总是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制高点思考语文教学的诸多问题”。于是，语文教学怎样同现代化建设接轨，怎样大大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就成为张老在语文教育研究领域所探索的主要课题。

一、从思维方式的层面，借鉴国外母语教育的有益经验，对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合理因素进行改造，使之科学化现代化。

张老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深于八十年代，其成果在当代尚无人可及，请看他说的带有总结性的话：

近百年来，传统经验中那一部分既符合汉语语文实际，又符合比较科学的教学论的做法，似乎没有受到重视，得到发扬，随着我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趋向一致的潮流，把那些做法加以改进以至改造，赋予它以时代精神和新的生命，进而与现代的教育科学、语言科学结合起来，形成一条既是传统的又是非传统的，适应汉语汉文特点的，适合现代需要的，我们自己的语文教学的路子。相反，传统做法中比较差的那一部分，影响似乎反而大一些，有的被原封不动的继续使用着，有的被部分修改甚至只是改头换面的使用着。把这种局面改变一下，扭转一下，真正做到继承传统中的优良部分，使之科学化、现代化，发扬光大，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责任。（1983年）



这是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纲”，一个语文教育大家开阔的学术眼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

研究传统如果停留在平面地罗列出几条经验几条局限，然后说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便万事大吉，那只是学术研究上的“例行公事”。张老的深刻独到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研究的视角投向在传统语文教育背后发生支撑作用的传统思维方式，从思维方式的层面去辨析传统。他说：“语文是个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它不仅受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制约，而且还受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特点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语言文字是该民族思维方式最内在的根据，语文教育的民族性与民族的思维方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因此，张老对传统语文教育思想在今天的消极影响有深切的认识：“传统实在太深厚了，举人、进士们和‘迁客骚人’们的幽灵依旧不时的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游荡着，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甚至左右我们的思考。”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语文教学缺乏科学性”，“把提高语文能力看作一种相当神秘的事，看作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或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事，看作一种只能听其自然，任其沉浮的事”，否认语文教学有一般的规律可循。在这神秘化的背后，正是重经验、重直觉的内倾、封闭的传统思维方式。张老认为，传统语文教育的非科学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轻视语文知识的教育：“始终没建立起适用于语文教学的知识体系。语文教学始终处于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凭朦胧的感觉和经验办事的状态，靠老师耳提面命，靠孩子们自己去体会、摸索”；二是轻视教学方法：“满足于对活动方式的初级概括”，“一方面否定方法，不相信方法，一方面有了

方法就定型搞程式化。”这两大积弊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思想根源，“同我们长期停滞的，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同与之相适应的那些思想、意识、习惯等”，有着必然内在的联系。这两大积弊制约着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而我们长期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缺乏自觉性。所以，张老急切呼吁：“实在需要从传统加于我们的忽视以至否定语言知识这个桎梏中解脱解脱了！”他主张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看看“外国在训练学生掌握本国语文方面采取了哪些有效的办法”，比如他们近一、二十年有过不少研究和试验，证明不仅仅对青年，就是对少年儿童也可以介绍一些理性知识，建立一些抽象概念，这对发展智力、培养能力是有益处的。当然，这里说的知识系统是指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而不是纯粹的语言理论知识系统，“不能把语文课搞成一门纯粹的知识课，而是以知识为先导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依归的课”。张老还对方法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方法制约着效果。只有科学的、新鲜活泼的教学方法，才能培养出一代具有活跃智力的，有进取精神，有效率感，有敏锐的现实感，有责任感的新人”，“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是探讨规律，根据探讨所得，寻求正当的方法，形成若干有用的、有效的模式，进而活用这些方法，活用这些模式，坚决反对、抛弃程式化”。

批判不等于简单地否定、抛弃，而是划清界限，划清新旧语文教育，新旧思维方式的界限，在这个基础上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合理内核”进行改造、实现语文教学的创新。比如如何对待多读多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记诵，模仿这条经验？张老首先肯定：“要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重要的一条是实践。传统的经验多读、多练、是可以的”。但必须认识到，它是由传统语



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是为封建科举考试服务的。而就经验本身来说,“不能说没有一点科学性”。但是,要读哪些东西呢?要读多少才管用呢?怎样读法呢?又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法、算法、教法,各行其是,随意性很大。所以张老又明确指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规律还需研究”,那就是这种方法“往往说不出多少道理,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认真的分析概括和总结,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学习者自己去摸索,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言传,不能用言辞明确的概括和描述出来,于是它不能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影响了知识、技能广泛和持续的传播交流,从而也就影响了它的发展。”从思维方式的层面揭露了“多读、多练”这条经验只重感性、经验而轻理性、分析的局限性。遗憾的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在借鉴这一经验时没有分析它的来源、性质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忘记了“今天的和十几二十几年后的年轻人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和当年的秀才们、举人们、进士们、状元们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大不相同了!这是我们探讨语文教学改革的时候必须时刻在念的!”张老尖锐指出,盲目提倡多读、多写这种“粗放经营”,使传统语文教学脱离社会需要的弊端直到今天还在严重影响着我们的语文教学。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具体表现为“不重视逻辑思维训练,不重视培养切合日用的语言能力……要学生发一些不切实际的议论,抒写一些不真实的感情,用一些自己也弄不清楚的词语,这对训练学生概念清楚,判断准确,推理合乎逻辑,不起作用,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因此,对这种传统的经验,必须要“加以改造,使之符合科学化的要求。语文教育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提高效率,事半功倍。”怎样改造使之成为科学的方法呢?张老主张:“配合着读和练适当提供一点必要的科学知识,并且考究

一下读和练的科学方法,从而提高读和练的效率……把传统经验和现代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达到事半功倍。”也即“对读和练进行一些研究,使之多带一些条理性,尽量减少其盲目性。”此外,古代训练表达能力也还是有“序”的,八股文的写作模式就部分地反映了议论文结构上的某些特点(提出问题,论述问题,得出结论),是对某些方面规律性的一种概括,是有用的。这种模式就是古人说的“大体则有,定体则无”的“大体”。今天的写作教学要借鉴它,那就要“取模式之长,废程式化之病,把这个‘大体’比前人更科学地概括出来,用更合理的方法引导学生较快的入门,免除他们摸索之苦。”在这方面,我们很多语文教育研究工作者和一线的教师作了不少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成效。实践证明,在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上,用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取代经验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选择。

一谈到语文教学的科学性,有些论者就只想到教材的“序列化”,训练的“模式化”,考试的“标准化”,把“应试教育”下语文教学的弊端统统归咎于对语文教学现代化科学化的追求。这是不公正的。其实,张老说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语文教学的科学性,指的是教学实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教学语文的规律。”而“语文教学的规律源于语言的规律,教学的规律,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显然,这是针对过去的语文教学中的随意性、散漫性即非科学性提出来的,并非轻视语文教学的人文性。他在1996年曾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加强语文教学中的人文因素,我不反对,但把它与科学性对立起来,就走向了极端。过去,我们是人文性与科学性都谈不上,我称之为四不像。把多年来语文教学没搞好的原因归结为强调了工具性,搞多了科学性,就离谱了。科学性和人文性都得加强!”事实是不是



这样呢？另外，张老主张的语文教学科学性并不像某些论者理解得那么绝对，把一切都序列化、模式化、标准化，走向了科学主义。他说：“既要探索几条大节节目的规律性的东西，也得容许教师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教学方法。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是指的这种情况，既不能没有一个基本准则，又不能列出一个非此不可的公式。”既不能散漫无“序”，又不能让“序”束缚手脚，把探寻规律变成杜撰公式。我们反对语文教学中的科学主义和科学主义看问题的方法，但不反对语文教学中的科学性和科学看问题的方法。科学主义是科学思维方式不断扩展，最终走向绝对化的产物，是科学性的异化。二者有联系更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张老关于语文教学科学性的论述中，个别具体意见有可能模糊了科学性和科学主义之间的界限，但从总体来看，方向是对的，其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语文课程的改革，对语言 and 语文能力进行现代阐释，科学地认识和处理语文教学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为了探索语文教学的规律，张老不仅以批判的眼光深入地研究传统语文教育，而且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国外课程改革特别是母语课改的经验，在融会中外母语课改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进行语文课改的思路和设想。他认为，“课程——包括课程的设置、结构、内容等……的发展，从来是和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形态制约着或者改变着课程，课程影响着（阻滞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课程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行必要的改革。语文教学要大

大地提高效率,同现代化建设接轨,进行课程改革就是必然的选择。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怎样进行语文课改呢?在张老看来,首先要对语文这个学科的本体——语言进行现代的阐释。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张老并不固守传统的语言观,而主张对语言的现代理解,表现出可贵的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他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语言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也随之须得更新,一些基本法则也要重新估计。”比如语言的本质和功能,他不同意原封不动地照搬“语言是交际工具”这个传统的定义,而应渗入“有现代意义的更具体的理解”。语言的交际功能原来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功能,而现在人可以和海底交际,可以和太空交际,还可以同机器交际;语言不仅可以转换为文字,还可以转换成数码和公式等等。因此,人们对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定义须作一番新的界定,那就是:“语言是表达感觉的工具,是进行思维的工具,是人类交流信息的工具,是教育和接受教育的工具,是发展生产力的工具。”所以我们要用一种新的视野来看待语言教育,使“教给下一代掌握的语言必须是全国通用的、在国际上通用的、规范化的标准语言。”张老还吸收了文化语言学的某些要素,从文化的层面和语文教学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语言的特性:“语言是人类知识结构中最低的,也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层次,中层和高层都是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不同于生产工具,本身“总是带着好些东西在里边的”,诸如知识的传授、思想的陶冶、思维的训练等等,因而我们“在教语言、学语言的同时,也就教了、学了语言里所带着的那些东西。……忽视了语言教育,不仅仅是忽视了语言本身,而实际上是忽视了许多东西。”他从这里看到了语言能力的重要性:



“也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特性，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如何、语言趣味如何……往往成为一个人文化教养高低、思维能力强弱的标志。”

有了对语言的现代阐释，必然会以开放的、多维的视界来确定语文教学的目标。张老是主张立足现在，更面向未来的。他说：“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设些什么课程，每门课程中讲些什么内容，用些什么方式，都要为未来的需要考虑。”“当然不能脱离今天的实际，但是脑子里不能没有个未来，——未来的生活，未来的世界，未来的需要。”就语文学科而言，要从今天的社会需要出发，顾及当前的实际来考虑今天语文课程的处理。”“今天的语文教学要考虑到七八年，十几年后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能力”。他在1984年曾预测过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们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语文能力：“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敏捷准确的高效率的口头和书面语文能力，将成为每个人的需要，能用尽可能经济的语言材料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达到尽可能高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收到尽可能强的表达效果，将被认为是写作的高手。”显然，他是从语文的功利价值层面，从发挥语文的基础工具性能和作用来进行预测的。以此来衡量，我们不能不钦佩他那与现代思维方式相联系的超前的眼光。他提出的语文教学同现代化建设接轨，即同学制改革接轨，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接轨，同信息社会、信息交流接轨，则更全面更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看到今天，想到未来”的现代眼光。

对语文本体和社会所需语文能力的现代阐释，这只是我们进行语文课改的一个理论前提。为了适应今天和今后的社会需要，语文教学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语文课改的主要任

务,应该是以一种系统思维来认识和处理语文教学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对这个问题,张老确立了最基本的思路 and 原则。他认为,要处理好语文课程的外部关系,“必须从这门课的课程结构入手”,在纵向上,“把高等教育前这一阶段的语文教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也就是说,从儿童的早期语文教育到高中、中专、中技阶段的语文教育是一个大系统,里面包括学前、义教、高中等几个子系统,它们像一根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不可缺少,而又环环相扣、互为条件、螺旋式上升;在横向上,要研究“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关系”,正如吕老说过的:“教学改革是一个整体,语文教学的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尽管改革是从这里开始的。”处理语文课程外部关系的基本原则,张老形象地概括为既要“瞻前顾后”,又要“左顾右盼”。语文课程的内部关系,指的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教育,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同知识传授、思想陶冶、思维训练等任务、功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语文教学的首要的、专门的任务是学习使用语言文字。文不通,语不顺,说话结结巴巴,就什么也谈不上。”这是“主”,其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另方面,语文教学还应该也能够承担知识传授、思想陶冶、思维训练等任务,这是语言特别是汉语汉文的特点决定的,否则“也是不符合实际,不完全妥善的”。这是“宾”,其位置也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任何时候也不要超越。处理语文课程内部关系的基本原则,张老也作了形象的概括:“不可喧宾夺主,也不可唯主独尊。”这些论述都触及到了语文课改的本质和规律,充满了唯物辩证法。

在论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语文课程的内部关系时,张老不仅仅是提出了基本思路 and 原则,而且对其中的一些焦点、难点问



题(如文学教育)也进行了具体而独到的分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还把文学教育作为语文教学的一项任务,到八九十年代,他则反复强调语文教学同文学教育要分开进行(语言、文学分科),不赞成把文学教育的任务归并到语文课中,它们不应是从属关系。那样做的结果是“两不像,两不沾,两败俱伤”。因为文学课的任务是进行文学教育,语文课的任务是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培养语文能力。在传统语文教育中,“语文能力”和“文学素养”的界限比较朦胧、模糊,分不清,形成一种大语文教育。到近代,随着时代的发展,“语文能力”的实用功能被强调,二者的分野日益明朗、确定,再也很难“共处”。这种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可以找到根据,可以进一步研究,让进一步的实践来检验。不管分歧有多大,中学生需要文学教育,需要文学素养(对文学的理解、欣赏、鉴别能力),却是不争的共识。张老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为文学教育除了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文学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文学最足以唤起人们的联想、想像,进而诱发创造性思维。”他说,为什么古往今来的大政治家、军事家、大科学家那么喜欢文学,爱好文学常常是他们光辉人格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境界犹如天马行空,极富有创造性,而文学也是海阔天空的创造性思维,二者思维的路子合拍了,易于产生共鸣。文学使他们的思想更活跃,更富于创造性。张老关于文学功能的见解抓住了中学文学教育的一个根本特点,对我们今天的语文课改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确,把文学教育的作用仅仅归结为提高鉴赏能力,固然是降低了它的功能,而升华到漫无边际的人文精神的培养,也嫌过于宽泛,在实践中易流于空疏。

三、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创建汉语辞章学,把汉语语言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语言的实际运用实实在在地结合起来,为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开拓了一条新路。

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同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为目的的语文教学脱节,彼此挂不上,是一直困扰语言学界和中语界的主要难题之一。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张老以创建汉语辞章学为标志,成为尝试解开这个难题的第一人。仅从《汉语辞章学论集》的内容来看,虽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门“桥梁性学科”还只是勾画出了主要轮廓,但堪称当代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中学术含量,最具实践意义的重大成果之一。虽然这门学科的内在价值尚未得到人们足够的认识,张老的探索也还未得到众多的响应,但汉语辞章学会按照学科自身应有的规律发展下去,它对语言学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深刻影响必将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张老的《汉语辞章学论集》有三个特点:

第一,内容建构按“从大到小又回到整体”的思路安排,以动态的即从大到小的研究为主,把静态的即从小到大的研究融会其中,鲜明体现了语言应用的基本规律。

汉语辞章学为什么从篇章开始,然后才是句读—语汇—一字?张老解释说:在语言实际运用中,特别是在书面交际中,总是以篇为对象,用篇作单位的,不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首先总是着眼于全篇,立足于整体的,“都是从篇入手,从大向小的活动。”这一序列因符合读写规律而显出了它的科学性。但同时,从小到大的静态研究,从字到词语到句、段、篇,找出层层组